

問卷訪問中 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

杜素豪**

摘要

在問卷調查的訪員訓練中，訪員均被教導必須避免第三者在場的訪問情境。但是，歐美的研究發現，實際執行的訪問調查不見得能控制百分之百無第三者的在場。不同的研究對第三者在場是否影響訪問結果則尚無一致的結論。不過支持第三者在場對訪問結果有影響者居多，只是影響關係為何仍有待進一步瞭解。至於在台灣執行的訪問調查中，第三者在場效應的研究至今闕如。因此，本研究企圖比較不同類型問卷題目間是否有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並分析此效應會以何種形式存在。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來自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三期二次卷（1996），並從兩個面向——答題品質與回答結果——探討訪答效應。初步的結果發現受訪者在事實性題目的答題品質比其他型題目者好。

* 本文之所以能完成，誠摯感謝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及『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提供研究資料，美國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 Eleanor Singer 教授、台東師範學院黃毅志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章英華教授與傅仰止教授、以及世界與美國民意調查研究學會聯合年會及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第三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研討會』之與會者對本文前身各版的建議。最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助理研究員兼副主任。



但進一步的邏輯迴歸分析結果則顯示第三者在場對各類型題目的答題品質並無明顯的影響。在回答結果的分析則顯示，社會讚許性題目多半無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可是第三者在場對回答結果的影響卻發生在事實性題目與敏感性題目上。

雖然分析結果無法完全支持第三者在場對敏感性與社會讚許性題目具有訪答效應的理論假設，但也並未因此否決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仍然存在的事實。未來，無論是在與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有關之理論發展、研究開發，或實務工作上均有待繼續努力。

關鍵字：訪答效應，訪答品質，訪問情境，第三者在場，社會讚許性、敏感性、與事實性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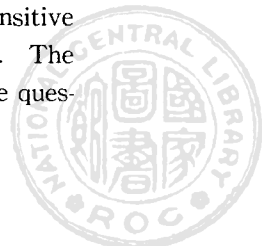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Survey Interview

Su-hao Tu

ABSTRACT

Interviewers are trained to conduct private interviews but would find that the presence of others in practice is hard to avoid. Despite of divergent conclusion,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suppor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esence of the third-person affects survey response across three types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family, marriage and gender roles respectively. Characterized by fact, sensitivity,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attributes.

The data analyzed is from Social Change Survey conducted in 1996. The quality of response to factual questions is found better than that to other types of questions. Howeve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third-person does not affect the quality of response to three types of ques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tual response to factual and sensitive questions varies with the presence of the third-person. The third-person effect does not happen to the response to the ques-



tions with social desirability.

This study does not fully support the hypotheses that the third-person would affect the quality of response and actual response to sensitive and social desirable questions more than that to factual questions. However, the findings do not totally reject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nclusio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re need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esponse effect, response quality, interview situation, the presence of the third person, social desirable, sensitive, and factual questions

前 言

在探問問卷調查訪答效應的理論中，訪問的過程牽涉到兩人之間特殊形式的社會互動，這種特殊的人際互動受到訪員與受訪者的角色扮演、問卷的特性、以及訪問情境的影響 (Sudman and Bradburn 1974; Dijkstra and van der Zouwen 1982)。爲了提高訪答的正確度與品質，絕對無第三者在場的理想訪問情境是否重要，到現在仍是被爭論的問題。

理論上，在面對面的訪談中有第三者在場的情境容易造成訪答品質與回答真實度的偏差。訪員被訓練應該執行單獨一對一的訪問工作，但是卻常常發現真正進行訪問工作時，排除第三者在場是最難控制的情境。然而至目前爲止，過去的實證研究似乎仍無法充分證明第三者在場對訪答結果具有明顯的影響。從理論觀點來看，這可能是因



為第三者在場常被視為影響訪答結果的一個次要訪問情境變項，或是因為第三者在場對訪答的影響程度可能受到其他變項（例如：問題形式與特性、調查管理方法、以及訪員與受訪者的特性）的影響而有所改變。至於其改變情形為何，雖前人的研究不無發現，但因證據仍嫌不足以至於至今有待檢驗。

根據 Bradburn (1983) 的說法，訪問工作的管理方式與問卷中問題的特性是訪答效應理論的重心所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也建議第三者在場對訪答結果的影響會因問題性質之不同有異 (Aquilino 1993; Smith 1997)。本研究因此企圖瞭解不同性質之問卷題目間受訪者的答題品質與回答結果是否受到訪談中有第三者在場的影響？其影響效果在不同題目之間是否有差異？差異程度為何？具體而言，本研究企圖解答下列三個問題：

第一、訪談中第三者在場與否是否受到訪員與受訪者個人特性的影響？

第二、問卷中哪類题目的答題品質與回答結果會受到訪談中第三者在場情境的影響？

第三、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第三者在場訪問情境的因素（如：訪員與受訪者個人特徵以及問卷訪填方式）之後，第三者在場情境對不同類型問卷題目之答題品質與回答結果的影響是否因此有所改變？

文獻回顧

訪答效應

調查訪問是一種特殊且有目的之對話形式的人際互動。此種人際互動關係具有下列三大特徵。第一、這種有目的對話需依據一些特定



規則進行一問一答的過程。通常，負責詢問的訪員被訓練必須向負責回答的受訪者提出客觀中立的問題，並獲得正確的回答。所以，在正確的問題引導、良好對談氣氛的掌握、以及和諧對話關係的營造等方面，訪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第二、這個目的性對話過程中，訪員需遵循一定的社會規範，避免受訪者隱私被侵犯或因此可能扭曲回答真實度的情形。第三、訪問工作最好是單獨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如何確定單獨的訪問情境，尤其是在牽涉到敏感性問題時，選擇適當的訪問地點與時間是過去文獻中一再強調的重要議題 (Caplow 1956; Morton-Williams 1993)。

經由這種特殊形式訪談的結果受到四大類因素的影響：(1)訪問工作的執行與管理方法、(2)來自訪員的相關變項、(3)來自受訪者的相關變項、以及(4)訪問情境 (Sudman and Bradburn 1974; Dijkstra and Van der Zouwen 1982; Bradburn 1983)。第一類因素包括問卷的設計與執行方法等。問卷的結構、長度、形式與難度、問卷的內容、問題的提問方法與用句、問題的次序、問卷調查的方法等都屬於這一類因素。這類因素多半受到研究者的決定與控制。第二大類因素包括訪員的個人背景、特徵與其對訪問工作的了解、表現與態度，例如：性別、省籍、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年齡、訪員在訪談過程中的用語與對訪談的態度、訪員對問卷的瞭解程度等。這類因素會影響訪員與受訪者之間訪談的流暢與訪談的關係。第三大類因素包括受訪者的個人背景特徵、接受訪問的動機、以及其在接受訪談過程中角色的扮演。我們通常希望受訪者瞭解其在訪談過程中應該扮演的角色、以便能夠毫不猶豫的提供我們真實的回答。然而在現實裡，問卷結構、問卷主題、訪員工作表現、或其他因素可能會減低受訪者提供真實回答的意願 (Martin 1984)。



第四大類因素包括一些超出研究者能力範圍之外的因素，例如訪問地點、訪問時間、與第三者在場等。爲了能控制這類環境變項，研究者通常會設計一些問題讓訪員能詳實的紀錄訪談的時間與地點，以及訪談期間周遭的環境狀況。不過，在過去訪答效應的研究中專注於訪問情境者相對來講明顯的不足。其中，討論第三者在場的訪問情境也不例外。理論上來說，在訪談中若有第三者在場對受訪者的回答會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其影響可能是降低回答的真實度（例如：隱瞞或過渡膨脹事實），也可能是降低訪答的品質（例如：模糊回答或不回答），最後則可能扭曲調查研究的結果。

綜合傳播學中民意形成與第三者效果以及社會心理學中的從眾原理，我們可以粗略的解釋第三者在場對訪問結果的影響。傳播學中的『沈默的螺旋 (Spiral of Silence)』原理所指的是一般大眾會尋求別人對自己意見的支持。由於深怕未能順利博得他人的支持而因此與社會隔離，人們會在必要時保留自己真正的意見，以免受到孤立或異樣的眼光 (Noelle-Neumann 1974；胡幼偉等 1994)。傳播學中另一個原理是『第三者效果 (Third-person effects)』，是指一般人常認爲別人比自己容易受到傳媒的影響。也就是，人們傾向認爲他人的態度較易被別人所影響，但自己的態度則較不受別人的影響。不過在這種認知之下，人們最後卻容易採取從眾的態度與行爲模式 (Gunther 1991; Reuband 1992)。若從社會心理學觀點，一般人具有基本的防衛心理，所以通常會有隱瞞、扭曲或拒絕回答自己在乎而不願意讓他人知道的事情。以上無論從沈默螺旋、第三者在場效應或從眾心理觀點所推測的態度或行爲反應會因爲有第三者在場產生強化作用，強化作用尤其容易發生在有敏感傾向或與社會規範密切相關的題目上。



第三者在場效應

以歐美為例，與第三者在場之訪答效應相關的實證研究直到 1990 年代才算普遍。不同的研究對第三者在場是否影響訪問結果有歧異的發現。其中討論第三者在場對訪答品質影響的研究顯得更少。Blair (1979) 在家庭居住安排的研究中分析答題遺漏的分佈後發現，訪問中有其他的成人在場時，在較具威脅性題目上，所得到的拒答率較高。這個發現也在 Hartmann (1995) 的研究中得到驗證。Hartmann 的研究是以德國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為例，分析已婚者在有他人在場情況下對收入題目（視為威脅性行為型題目）與對愛滋病的態度（視為威脅性態度型題目）的答題品質（含拒答，不知道，與其他遺漏等情況）的改變。

除了答題品質，多半的研究著重在第三者在場對回答結果的影響。有的研究僅著重在第三者在場與否的影響，有的則將第三者在場分為大人與小孩或是配偶與小孩等不同情境類型加以探討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這些研究發現多所分歧。其中，少數如 Blair (1979) 的研究發現，在各類型題目的回答傾向不受任何類型第三者在場的影響。分析配偶在場對受訪者在家庭與夫妻感情支持的回答之影響的研究中，Pollner and Adams (1997) 也發現雖然配偶出現在訪談過程中的頻率很高，但對受訪者的回答沒有明顯的影響效果。除此之外，其餘較多數的研究則發現第三者在場對訪答效應多少有所影響。這些研究背後的假設是各類型問卷題目具有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的存在。訪談過程中有他人在場時，受訪者所提供的回答內容會有遠離實情的現象。從回答結果的分佈在有無第三者在場之間是否呈現系統性與統計顯著性的差異中，我們可以得到瞭解。



在研究美國民眾投票行為與第三者在場的關係中，Silver 與其同事（1986）以在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所蒐集的四年問卷調查與官方紀錄資料分析第三者在場對受訪者答題結果的影響，研究發現有年紀較大的第三者在場時，未去投票的受訪者較有不實回答的傾向。若有配偶或小孩同時在場時，受訪者較有不實回答的傾向。不過，經過進一步的迴歸分析卻發現，受訪者回答屬於社會規範性題目時不見得受到他人在場的影響（Silver et al. 1986）。Aquilino（1993）在以美國家庭為主題的全國性調查中選擇十一項與婚姻關係有關的題目為研究變項，且將這些變項分為主觀的態度變項與客觀的事實變項兩大類。結果發現配偶在場會影響受訪者在婚姻態度方面的回答。整個訪問過程中配偶均在場的受訪者對婚姻的態度比較正面。在事實性題目上，配偶在場的訪答效應則不如預期般顯著。不過在有顯著影響的項目中，當有配偶在場時，受訪者投入家務工作的時間較短；但所回答之配偶的家務工作時間則較長；婚姻關係衝突頻率較高；以及較有婚前同居的情況。

Smith（1997）則從是否有任何第三者在場以及是否有小孩在場兩個面向討論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他以 1994 年蒐集的美國一般社會調查資料分析生育價值、性別角色、婚姻觀念、兩性關係等問題的回答。結果發現第三者在場效應不如 Aquilino（1993）所發現的顯著。但不同性質題目間的顯著度則有差異。大致上，在婚姻關係、自我健康評估、與人際互信相關的題目上有顯著的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

綜合以上，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尚未探究卻值得繼續努力的議題。第三者在場對問卷的回答品質的確具有負面的影響。但是，由於其研究的重心是放在所界定的具有威脅性的題目上，這種負面影響是否適用於其他類型的題目上則仍有待解答。其他訪答效應之研究雖然無法



充分證實各類型問卷題目的回答均會受到第三者在場的影響，部分的研究的確也發現，在政治、婚姻或人際關係、以及健康評估等相關議題上，受訪者的回答會受到第三者在場的影響（無論這個第三者定義為配偶、小孩或者均可）。不過，當許多研究探討受訪者與訪員特徵對不同類型題目的影響之際，很少研究分析他人在場對不同性質題目答題的影響。可見廣泛的比較不同類型題目之第三者答題效應的研究仍有繼續的必要（Aquilino 1993; Smith 1997）。

根據過去的文獻，基本上，訪員與受訪者的個人特徵對敏感、威脅性、或社會讚許性題目的回答有重要的影響（Sudman and Bradburn 1974; Dijkstra and Van der Zouman 1982）。通常我們可以將會造成訪答效應的題目分成三大類型。第一類型是在主觀判斷上對一般人來說不合法、不尋常，或容易造成受訪者焦慮的事實或態度行為型題目（Blair 1979; DeMiao 1984）。這類的題目可以歸類為敏感性或威脅性題目。第二類型則牽涉到一些對受訪者具有提供社會規範或價值等暗示性的問題，也就是暗示受訪者需要盡量接近於社會規範的方向去回答的問題，這類問題可界定為社會讚許性題目。除了這兩類型的題目之外，尚有屬於事實描述而不牽涉任何主觀判斷或誤導個人態度行為的問題，這類問題可界定為事實性題目。這三類型題目的訪答效應除了受到前述訪員與受訪者個人特徵因素的影響之外，第三者在場是否也會造成受訪者在這三類問題回答上明顯的差異則有待進一步的比較分析。

早在1962年，Taitz的研究可算是意圖達到此比較分析的目的。他以荷蘭鄉村老年人為研究對象，發現無論是小孩或配偶，任何形式的第三者在場對他們在出生地點、農場面積等這類的一般事實性問題的回答無任何的影響。但是，在有小孩在場時，他們的家庭觀念



比較傳統，若是配偶在場則其觀念較現代 (Taietz 1962)。不過，Taietz 只是比較社會讚許性與一般事實性兩類題目之答題效應。至今同時比較三類不同型題目之訪答與第三者在場之關係的實證研究則仍然缺少。

第三者在場的相關因素

通常我們在分析他人在場對訪答的主要效應 (main effect) 時假設他人在場是隨機性發生的。然而根據前人的研究發現，隨機發生的可能性不高。有第三者在場的受訪者多半是男性、年紀較輕、教育水準較高、無職業、或者已婚者 (Blair 1979; Aquilino 1993; Hartmann 1994)。另外，問卷填答方式也可能是影響第三者在場發生的因素之一。以訪填方式進行的問卷調查第三者在場情境的發生較普遍 (田芳華 1996)。所以，控制以上的變項之後，第三者在場的主效應會因此降低或變成不存在 (Aquilino 1993; Smith 1997)。這點顯示由訪答效應理論所推論之第三者在場效應有可能會透過不同問卷問題的特性以及受訪者與訪員的個人特徵或態度行為的表現而產生。至於其存在的形式為何與可否通用於各種類型题目的訪答中則仍有待檢驗。

本研究的理論假設

綜合以上，本研究有了以下驗證第三者在場之訪答效應的研究假設。第一個假設是訪問過程中第三者在場對答題品質與回答結果有顯著的影響。第二，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發生在敏感性與社會讚許性題目比發生在事實性題目者顯著。第三，不同類型第三者在場可從訪員與受訪者的基本特徵得以預測。第四、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會受到與之有密切相關的訪員與受訪者個人特徵的影響而減低。



資料與測量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來自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三期二次問卷 I (1996) 中經過分層三段隨機選取，最後完訪的 1720 位二十歲到六十五歲的成人。本研究分析的依變項有二，分別是各類型題目的答題品質與回答結果。答題品質指的是每一題目之無效回答 (non-valid response) 率，無效回答率越低表示答題品質越好。無效回答率主要是用來表示那些對訪員或研究者無意義或不清楚的回答，與一般研究用的未答率 (non-response rate) 在概念上是不同的。未答率所包含的無答與拒答專指純粹的答題遺漏情形，本研究則廣義的更包含了模糊回答 (例如：態度題目中回答無意見或不確定等)、及『不知道』或『不瞭解題意』的回答等。這些指的是受訪者嘗試回答但卻失敗的結果。本研究整合兩層面的回答品質一則因為失敗的回答通常是被排除在有效的結果分析之外且對分析的結果無貢獻，再則認定這種廣義的指標對於尤其是態度類型題目之答題品質分析來說應該更貼切。

另一個依變項是回答結果。指的是排除上述無效回答之後所得之實際回答的分佈情形。各類型的題目則選自本問卷調查中與性別角色、婚姻與家庭等相關之題目。根據下列三種標準，這些題目分成三大類型：事實性、敏感性、與社會讚許性題目。第一個標準是根據過去文獻的建議。第二個標準是參考由訪員執行的問卷評量結果。這些訪員分別根據他們實際的訪談經驗，對問卷中各題題目做文句措辭、歧義性、防衛性、社會讚許程度、題意瞭解、與採用程度等六方面的評分。第三、為了與國外相關的研究有所比較，本研究選擇與 Smith (1997) 在其研究中所採用之相同或近似的題目。



在事實性題目方面，本研究選擇同住之家人總數。在敏感性題目方面則選擇個人收入與家庭收入。原問卷中所設計的收入答項將零到二十萬元分為八類組提供受訪者選擇。不過這個類別變項經由指定每一類組之組中點之後轉換成連續變項。其餘屬於兩性角色與婚姻關係的問題則歸屬於社會讚許性的題目。這些題目包括兩項有關性別角色態度的題目：『如果母親外出工作，對還沒上學的小孩比較不好』與『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妻子的責任就是照顧家』；以及兩項有關婚姻觀念的題目：『只要男女雙方相愛，同居也沒什麼不好』與『只要男女雙方相愛，即使是婚外情，也是可以諒解的』。受訪者在這些態度問題上可有四種回答，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由於兩項性別角色與兩項婚姻觀念題目的用字上代表著相反的價值觀念。為了取得一致的價值取向，將婚姻觀念題的回答分數做反向編碼的處理，使轉換之後分數與未作編碼轉換之兩性角色觀一樣，由低（1分）到高（4分）代表現代到傳統的價值觀。

本研究的自變項第三者在場情境指的是訪問過程中除了訪員與受訪者以外，有其他人在場的情況（Blair 1979）。這裡指的他人，包含任一或多位、相關或不相關、熟悉或不熟悉、不論性別、不論年齡大小的人。為能更詳盡比較各種第三者在場的情境，本研究除無第三者在場之外，將第三者在場細分為只有小孩在場、只有成人在場、以及小孩與成人均在場。由於研究資料的限制，本研究不考慮其他與訪員或受訪者角色扮演等相關的主觀變項，僅採用訪員與受訪者個人基本特徵的客觀變項為控制變項（Dijkstra and Van der Zoumen 1982）。受訪者個人特徵有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宗教信仰、與省籍，而訪員個人特徵則有性別。另一個重要的控制變項為問卷填答方式，在原始資料中這個變項的回答分為受訪者自填、訪員訪填、透過第三



者翻譯訪談、與其他等四類。本研究將第三者翻譯歸入「訪員訪談」並將「其他」視為無法歸類不列入統計分析中。在最後的迴歸分析中，所有類別屬性的自變與控制變項均以產生虛擬變項的方式處理。其中，第三者在場變項以無第三者在場為對照組，因此衍生的虛擬變項分別為只有小孩在場、只有成人在場、與兩者均在場三個。性別變項均以男性為對照組，受訪者婚姻以未婚狀態為對照組，宗教信仰中以無宗教信仰者為對照組，省籍則以原住民為對照組，問卷填答方式則以自填為對照組。

分析結果

樣本特性與第三者在場

表一顯示研究樣本的基本特性與不同第三者在場情境的分佈。其中，男性受訪者較多（52%）；已婚者的比率高達約百分之八十三。閩南人的比率最高（77%）。有宗教信仰者約百分之八十五。本研究對象平均約 40 歲左右；有約高一的教育水準；個人的月收入平均在三萬四千元左右；而家庭的月收入則在七萬元左右。¹ 有第三者在場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這與歐美的德國、美國、與荷蘭等只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情形比較，有偏高的現象（Taietz 1962; Blair 1979; Reuband 1992; Hartmann 1994）。在有他人在場的訪問情境中，只有

1 本研究最後分析的樣本數為 1720，但在收入題目的有效案數上卻減少許多（個人收入與家庭收入題分別為 1683 與 1628）。有效樣本數劇減引起的資料損失對研究結果不免有所影響。不過，這個現象正好是本研究探討答題品質與結果所關心的重點。也就是嘗試說明這類敏感性題目的回答品質對研究結果是否具有負面的影響效果。



表一 樣本特性與第三者在場

變 項	%(有效樣本數)	
性別：女性	48.0(1720)	
婚姻：已婚	82.8(1720)	
省籍：閩南	77.1(1714)	
客家	12.0	
大陸各省	10.3	
原住民	0.6	
宗教信仰：有	84.5(1677)	
第三者在場：無	28.7(1720)	
僅小孩在場	12.5	
僅成人在場	34.8	
兩者均在場	24.1	
	平均數(標準差)	有效樣本數
教育年數	10.07(4.4)	1719
年 齡	40.26(10.9)	1720
每月個人收入(NT\$1000)	34.12(35.9)	1683
每月家庭收入(NT\$1000)	68.81(50.9)	1628

成人在場者約佔百分之三十五，只有小孩在場者約為六分之一，兩者均在場者則約在四之一左右。綜合這三種情況，有成人在場的情況（不論是只有成人或與小孩同時在場）比較普遍。

本研究利用多項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訪談中受訪者或訪員的特徵在各類第三者在場情境之間是否呈現明顯的差異，並瞭解那些受訪者個人特徵可以預測不同類型第三者在場情境之發生。表二顯示受訪者的婚姻狀態、年齡、教育程度、個人收入、訪員性別、以及問卷填答方式分別對訪談中不同類型第三者在場



表二 第三者在場的多項邏輯迴歸分析

自變項	Ln(小孩/無人)		Ln(成人/無人)		Ln(小孩與成人/無人)	
	迴歸係數	標準誤	迴歸係數	標準誤	迴歸係數	標準誤
婚姻(未婚) ¹	2.4208***	.4155	-.1096	.1938	1.4348***	.2485
年齡	-.0506***	.0113	-.0144	.0078	-.0531***	.0089
教育年數	-.0122	.0282	-.0860***	.0199	-.0915***	.0222
每月個人收入	-9.7E10-6**	3.64E10-6	-8.1E10-6***	2.5E10-6	-8.0E10-6**	2.7E10-6
每月家庭收入	3.1E10-6	2.35E10-6	2.9E10-6	1.7E10-6	3.2E10-6	1.9E10-6
性別(男)	.7784***	.1879	-.2067	.1442	-.3313*	.1603
宗教信仰(無)	.0927	.2767	-.0412	.1877	-.0463	.2089
省籍：(原住民)						
閩南	-.4256	1.027	-.4086	.8497	.3598	1.0197
客家	-.2540	1.061	-.0504	.8711	.7820	1.0399
大陸各省	-.5480	1.0722	-.1132	.8751	.2160	1.0504
訪員性別(男)	.1843	.1879	.1796	.1358	.2412	.1496
填答方式(自填)	.8400*	.3402	.4739*	.2217	.6104*	.2527
常數	-1.699	1.2742	1.7161	.9441	.8863	1.1510
-2 Log-likelihood	-1909.99					
Model X ²	226.90***					
有效樣本數	1526					

1. 自變項後括弧內為對照組

2. *p<0.05, **p<0.01, ***p<0.001



有顯著的影響（在 0.05 顯著水準之下）。其中，與無人在場比較，只有小孩在場的訪談情境通常較發生在已婚、年輕、個人收入低、或女性的受訪者身上。也就是，在訪問已婚者、年輕者、個人收入低者、或女性時，訪談中較容易有且只有小孩在場的情況。比起無人在場的情境，教育程度或個人收入低的受訪者較容易發生只有成人在場的情況。兩者均在場則多發生在已婚、年輕、教育程度低、月收入低，或男性的受訪者身上。以訪填方式進行的訪問無論那一類型第三者在場發生的可能性均較自填者高。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肯定當受訪者是已婚或年紀較輕時，在其接受訪問的過程中較容易有小孩在場（不論是否有其他成人共同在場）。較低教育程度的受訪者較易在有成人在場（只有成人或小孩成人均在場）的情況下接受訪問。個人收入及問卷填答方式是唯一與所有類型之第三者在場密切相關的變項。個人收入較低者較可能在有任何的他在場時接受訪問。受訪者的性別對兩類有小孩在場的發生（只有小孩在場與有成人陪伴的小孩在場）有影響，但影響的方向卻正好相反。這很可能的解釋是已婚且負起褓姆職責的女性接受訪問者通常容易只有小孩在場情況。

除了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及性別之外，本研究在受訪者特質對第三者在場之影響方向上所得到的發現與美國類似研究的結果是相似的 (Blair 1979; Aquilino 1993)。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訪談中任一型的第三者在場均非隨機發生的。那麼，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就應該不是完全獨立於其他變項的影響效果之外，可能是因受訪者個人特徵變項與第三者在場之間有相關性存在而產生的。過去的研究結果建議第三者在場與訪答效應的關係事實上是虛假的 (spurious)，當我們控制了與第三者在場相關的變項之後，第三者在場對訪答之主要影響效果將



降低或轉為統計上的不顯著。不過，到底這些個人特徵對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具有什麼程度的影響，是否真正造成第三者在場效應虛假的存在，甚或是以其他的形式存在，均有待進一步多變項分析的驗證。

第三者在場對訪答的影響

不過在做進一步的驗證之前，本研究先針對第三者在場與答題品質或回答結果的關係做初步的探索。誠如文獻回顧中的討論，訪答效應與問題性質有密切的關係。為了瞭解受訪者對不同類型問卷題目的回答是否因訪談過程中有他人在場而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分別採用卡方檢定與 F 檢定分析各類型題目的答題品質與回答結果在各類第三者在場（無他人、只有小孩、只有成人、與小孩成人均在場）之間的差異。

表三顯示若只論有無第三者在場，一般來說，受訪者在事實性題目上的答題品質比在其他型題目者好。在涉及家庭收入題目以及多半社會讚許性題目的回答品質較差。進一步的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除了『母親工作對小孩不利』的兩性角色態度題目之外，其他的題目之回答品質在各種受訪者與他人在場有關的訪問情境間無顯著的差異。從無效回答率可大致發現，接受訪問時只有其他成人在場的受訪者對「母親工作對小孩不利」這一題的回答品質最差。有第三者在場時受訪者的答題品質均比無他人在場時為差。

關於各類型題目的回答結果，經由 F 檢定的結果顯示四種訪談情境之間受訪者在事實性題目、敏感性題目與部分的社會讚許性題目上的回答有顯著的差異（至少在 .05 顯著水準之下）。首先，有他人在場時受訪者所回答的平均同住家人數比無他人在場者多（表四）。其中又以兩者均在場者最多。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是以面對面家庭



表三 第三者在場與各類型題目無效回答率

問題項目 (有效回答數)	無效回答率 (%)	第三者在場與否			
		無人在場	小孩在場	成人在場	兩者皆在場
事實性題目					
同住家人總數(1720)		0.0	0.0	0.0	0.0
敏感性題目					
每月個人收入(1683)		1.6	2.3	2.7	1.9
每月家庭收入(1628)		5.5	6.5	5.2	4.8
社會讚許性題目					
母親工作對小孩不利(1616)		4.1	5.1	8.2	5.8*
男主外女主內(1633)		4.9	3.3	6.4	4.3
可婚外情(1602)		6.9	4.2	8.9	5.3
可婚前同居(1565)		8.5	1.3	3.6	7.0

1. 卡方檢定

2. *P<.05 **P<.01 ***P<.001

訪問方式蒐集的，很自然的當所訪問的家庭同住人數愈多，訪談中第三者在場的機會就愈大。在與收入有關的題目方面，有他人在場情況下接受訪問的人所回答的個人或家庭平均月收入均比無他人在場的受訪者為低。其中，在只有小孩在場情況下接受訪問的受訪者所回答的個人收入最低；而有小孩與成人同時在場時接受訪問的受訪者所回答的家庭收入最低。在社會讚許性的題目上，F 檢定結果顯示在四種第三者在場訪問情境之間回答結果並無顯著差異（0.05 顯著水準）。

爲了進一步分析訪答效應如何受到第三者在場的影響以及受訪者與訪員個人特徵對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又有何影響，本研究分別採用邏輯迴歸與複迴歸作兩階段的模式分析。邏輯迴歸是在分析第三者在



表四 在不同第三者在場間各類型題目回答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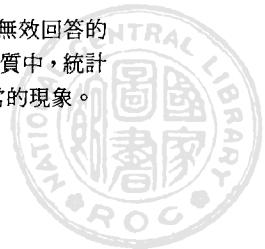
問題項目 (有效樣本數)	平均數(標準差)	第三者在場與否			
		無人在場	小孩在場	成人在場	兩者皆在場
事實性題目					
同住家人總數(1720)		4.39(2.07)	4.95(1.68)	4.69(4.12)	5.31*** (1.91)
敏感性題目					
每月個人收入(NT\$1000)(1683)		41.7(40.8)	29.5(33.0)	30.8(32.4)	32.8*** (32.1)
每月家庭收入(NT\$1000)(1628)		74.7(52.9)	68.6(48.1)	66.3(50.7)	65.6*(49.7)
社會讚許性題目					
母親工作對小孩不利(1616)		2.94(.67)	2.96(.64)	2.95(.67)	2.91(.68)
男主外女主內(1633)		2.64(.85)	2.63(.75)	2.74(.83)	2.77(.83)
婚外情(1602)		3.11(.67)	3.17(.58)	3.13(.66)	3.21(.63)
可婚前同居(1565)		2.90(.72)	2.92(.73)	2.87(.76)	2.97(.73)

1. F 檢定

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場的答題品質效應,² 而複迴歸則是分析第三者在場的回答結果效應。每一迴歸分析均包含兩個階段的模式分析。第一階段是不做任何變項之控制處理情況下, 分析第三者在場單獨的訪答效應。第二階段則是分析控制了受訪者及訪員個人特徵相關變項之後, 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的改變情形。從兩階段模式分析之間第三者在場變項的迴歸係數與其顯著度之改變, 我們可以判斷控制變項對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的影響。另外, 由於在『全家同住總人數』的題目上沒有無效回答, 無

2 在答題品質的邏輯迴歸分析的樣本數中不僅包含有效回答的個案, 還包括無效回答的個案(其中有效回答者設定為對照組)。所以, 例如在「家庭收入」的答題品質中, 統計分析的總樣本數(1660)比在樣本特性分析中的有效樣本數(1628)高是正常的現象。



法以邏輯迴歸分析事實性題目的答題品質，所以不列入本研究的最後分析中。

從表五可以發現無論有無控制受訪者與訪員個人特徵及問卷填答方式變項，第三者在場對訪答品質無任何顯著的影響效果。這個結果正如從表三的結果可以預期的，訪談中有第三者在場對訪答品質沒有明顯的影響，也因此推翻本研究的第一與第三個假設。另外，以上結果因無從比較各類型題目之間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的差別，也就是無法證實是否敏感性與社會讚許性題目之回答品質比在事實性題目之回答品質更具明顯的第三者在場效應，因此也推翻本研究的假設二。也就是說，不見得因無第三者在場受訪者就比較願意回答問卷或回答比較敏感或有社會規範暗示的題目。綜合而言，不論是在第三者在場的影響程度上，或是在不同類型之間影響程度的比較上，本研究的發現不僅與理論所預期的有一段距離，與前人的發現也正好相反。由於本研究在答題品質所使用的指標與前人只用漏答者差異大；又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在對訪員工作督導與管理上有嚴格的完訪、問卷調查、與督導複查的規定，可能因為這樣，研究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為基礎的研究假設大異其趣。

從另一個訪答效應的面向——實際回答的分佈——的分析結果發現，除了母親工作對小孩不利與婚前同居的態度題之外，其他題目之回答均具有不同類型的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表六）。經過兩階段模式分析的結果，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大略以四種形式存在。第一種是無論有無控制受訪者與訪員的個人特徵或問卷填答方式，任何的第三者在場對於同住家人總數與個人收入之回答均有顯著的影響（至少在0.05顯著水準之下）。不過，根據標準迴歸係數與顯著性檢定結果的改變，控制了受訪者與訪員的個人特徵以及問卷填答方式之後，第三者





表五 各類型題目答題品質之邏輯迴歸分析

依變項	Ln(無效回答/有效回答)											
	敏感性題目					社會讀許性題目						
自/控制變項	個人收入		家庭收入		母親工作		男外女內		婚外情		婚前同居	
	model 1	model 2	model 1	model 2	model 1	model 2	model 1	model 2	model 1	model 2	model 1	model 2
自變項：	---											
第三者在場(無)：	---											
小孩	---											
成人	---											
兩者	---											
控制變項：	---											
受訪者：	---											
性別(男)	---											
年齡	---											
教育	---											
婚姻(未)	---											
訪員性別(男)	---											
填寫方式(自填)	---											
常數	-4.03***		-.281***		---		-6.13***		---		---	
-2*log likelihood	336.7	324.3	687.9	665.4	13.97	0	28.6	7.46	65.95	39.58	51.70	37.50
Model X ²	.84	13.25	1.14	33.66**	2.81	16.78	2.15	23.31*	1.82	28.19**	4.31	18.50
有效樣本數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 *p < .05, **p < .01, ***p < .001
2. 表中僅列顯著之影響變項，未顯著者以“—”代替
3. 未標示任何數字或“—”者，表示變項未進入模式分析中
4. 自變項後之括弧內表示對照組
5. “同住人數”未列入表格，因為此題無效之回答等於零，無法以迴歸分析。
6. 有效樣本數指的是用在分析答題品質所使用的總樣本數，此總分析樣本數包含發生在依變項之無效回答的個案，所以本應為1720人。不過，因自變與控制變項的無效樣本無法列入分析，最後分析的案數降至1616。

表六 各類型題目答題效應之標準複迴歸分析

依變項	事實性題目		敏感性題目		社會譴評性題目					
	同住家人數 model 1	model 2	個人收入 model 1	model 2	家庭收入 model 1	model 2	婚外情 model 1	model 2	婚前同居 model 1	model 2
自/控制變項										
自變項：										
第三者在場(無)：										
小孩	.100***	.063*	-.115***	-.074**	—	—	—	—	—	—
成人	.075*	.069*	-.149***	-.084**	-.079**	—	—	—	—	—
兩者	.201***	.166***	-.104***	-.078*	-.068*	.065*	.065*	.076**	—	—
控制變項：										
受訪者：										
性別(男)	—	—	-.263***	—	—	-.200**	.104***	—	.142***	—
年齡	-.180***	—	—	—	—	.119***	—	—	.146***	—
教育	-.091**	—	.329***	—	.413***	-.346***	.085***	—	—	—
婚姻(未)	.133***	—	.204***	—	—	—	—	—	.069*	—
信仰(無)	.060*	—	-.057*	—	—	.066**	.069**	—	—	—
訪員性別(男)	—	—	—	—	—	—	.069**	—	—	—
問卷填寫方式(自填)	—	—	-.059**	—	-.095***	.048*	-.083**	—	—	—
調整後 R ²	.029***	.063***	.017***	.233***	.003*	.176***	.001	.027***	.001	.058***
有效樣本數	1616	1616	1581	1581	1527	1534	1502	1502	1468	1468

1. *p<.05, **p<.01, ***p<.001;

2. 表中的係數為標準迴歸係數 B

3. 表中僅列顯著之影響變項，未顯著者以“—”代替

4. 未標示任何數字或“—”者，表示變項未進入模式分析中

5. 自變項後之括弧內表示對照組

6. “母親工作對小孩不利”題不在表格中，因為此題無任何自變項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在場對回答的影響有減低現象。

從顯著度的改變來看，第三者在場對這兩題目回答的主效果影響仍強(尤其在個人收入的回答上)；而且控制變項加入之後的模式二之解釋力(調整後 R^2) 比模式一有明顯的增加。因迴歸分析中通常發生的這類自變項之間小幅度的多重相關，我們可以確定第三者在場對這兩個题目的回答具有單獨的主效應。而從模式二的標準迴歸係數可知，有第三者在場(無論哪一種第三者)時，受訪者所回答的同住家人總數比無第三者在場時的受訪者所回答的多。若比較模式二中影響訪答結果的各個因素，受訪者年齡、婚姻狀態、與小孩與大人均在場的訪問情境對同住家人數預測力最高。而受訪者教育程度、婚姻狀態、與性別則比第三者在場情境對訪答結果的影響大。

本研究對事實性題目答題之分析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所發現的不受任何第三者在場影響是完全相反，個中原因也許是本研究所採用的題目在主題上與第三者在場息息相關，因此無法突顯事實性題目之答題效應與其他性質題目答題效應間的差異。

第二類的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是虛假效應。這個虛假效應發生在家庭收入與『男主外女主內』態度題目上。根據表六模式一中的迴歸係數，在只有成人在場或成人與小孩均在場時接受訪問者所回答的家庭收入比無任何第三者在場時接受訪問者所回答的低。同時有成人與小孩在場時接受訪問者對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態度比在無人在場時接受訪問者為傳統。但是，控制了訪員與受訪者個人特徵及問卷填答方式後，無論以上任何類型的第三者在場效應均不顯著(未達 0.05 顯著水準)。這顯示，在敏感性與社會讚許性這兩题目的回答具有的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事實上，這兩題的回答受到受訪者個人特徵(教育程度、性別、年齡、或信仰)與問卷



填答方式的影響較大，亦即原來第三者在場效應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些控制變項而存在。

由模式二，在家庭收入的答題上不具任何獨立的第三者在場效應，明顯的與在個人收入答題效果有很大的差異。從傳播及心理學理論角度來看，個人收入與家庭收入均屬於較容易因有第三者在場而引起受訪者答題有所差異的主題。本研究在個人收入上驗證了這個理論，但卻無法在家庭收入的訪答中得到驗證。另外，由家庭收入答題效應中，異於個人收入答題效應有多個影響特徵，唯有教育程度與問卷填答方式對家庭收入有明顯的影響效果。這可能是回答家庭總收入的困難度比個人收入者大，因此比較起來，我們可以由教育程度分辨出家庭收入的差異，其他個人特徵或問卷填答方式與第三者在場則均無影響的區辨力。至於在社會贊許性「男外女內」態度發生的第三者在場虛假效應則與 Smith (1997) 的發現較近。

第三種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是控制了其他個人特徵與問卷填答方式變項之後，第三者在場效應產生增強效果。由表六的模式一得知，同時有小孩與成人在場時接受訪問者比無任何其他人在場時接受訪問者在婚外情的態度上有明顯的差異。無他人在場時接受訪問的受訪者的婚姻態度比較開放。而模式二中顯示控制了受訪者與訪員特徵及問卷填答方式之後，根據標準迴歸係數的數值略增可知，小孩與成人均在場之訪問情境對此題答題結果的影響有小幅的增強。這表示小孩與成人均在場的直接主效應不僅存在且同時受到訪員與受訪者個人特徵的小幅削弱。這個主效應顯示有小孩與成人均在場時，受訪者在婚外情的態度比無人在場者保守。在本研究對象均為成人且已婚者比率高達七成的情況下，在婚外情的反應比較受到多數家人在場的影響是很可能的。最後，第四種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發生在婚前同居態度題上。



就是第三者在場效應均不發生。這個發現與本研究的理論假設中敏感性及有社會規範性題目的第三者在場答題效應也是不一致的。

綜合以上，比較起來，不論是否控制其他受訪者與訪員個人特徵與填答方式，第三者在場效應削弱或不發生似乎是大多數。表六顯示這種情形尤其出現在態度題目上。例如：無任何類型第三者在場效應現象發生在「母親工作對小孩不利」與「婚前同居」兩項態度之回答上。在只有成人在場接受訪問者，對各種社會贊許性題目之回答與無人在場時接受訪問者之回答沒有明顯的差異。第三者在場在這些讚許性題目的訪答效應不如其他性質題目者顯著。這個發現只有部分的支持本研究之假設二。不過從分歧之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我們仍確定雖然本研究理論假設未得到完全的支持，至少在有第三者在場的效應中，答題的效應與前人研究的結果雷同，且再次加強第三者在場的效應是存在的。然而其存在的形式則值得吾人繼續研究。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計劃之調查研究資料為例初步發現，訪問調查中有第三者在場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之多。比起國外調查方法研究先進的西方國家來說顯得較高。爲了證實第三者在場對訪答各有影響，本研究進一步嘗試以前人發展的訪答效應理論爲基礎，從問卷訪答品質與回答結果兩面向檢驗問卷調查之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由於這兩個面向除了受到可能的第三者在場影響之外，也與問卷問題性質，問卷填答方式，以及訪員與受訪者個人特徵有密切的關係，本研究從受訪者在不同性質之題目的回答上做比較，發現了不同類型之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



在分析第三者在場效應可能的存在形式之前，本研究先分析與第三者在場息息相關的因素。結果發現訪談中他人在場並非隨機發生的。在進一步的迴歸分析中，本研究用兩階段的模式分析檢驗各類型第三者在場的效應強度與其改變。結果發現，在答題品質上毫無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而在實質的回答上則粗略顯示在社會讚許性題目的回答上多半無第三者在場的訪答效應。有的話則通常因控制了其他受訪者與訪員個人特徵等變項而減弱或消失。只有在婚外情態度上發現小孩與成人均在場的情形與受訪者個人特徵有互相加強的效應。只有在個人收入題上，任何類型之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即使控制了受訪者與訪員個人特徵及問卷填答方式之後均很顯著。然而，出乎本研究之理論假設之外，事實性題目之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反而顯著。

以上分歧的結果不完全符合本研究的理論預期，未來在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之研究在理論建構上仍有待修正。儘管如此，本研究仍具有下列的貢獻。第一、訪談中的第三者在場與否的確不是隨機發生的，我們可從受訪者的個人特徵以及問卷填答方式預測其發生的可能性。第二、訪談中第三者在場效應並不如訪答效應理論或部分文獻所建議的次要。本研究所發現在同住家人總數與個人收入上的第三者在場主效應是個明白的反證。不過，這並不是表示我們就可以完全推翻無第三者在場效應之說。只是本研究至少提醒我們第三者在場仍會影響訪答。第三、本研究對本土訪問情境之研究具有拋磚引玉的功能，未來訪答效應理論架構應如何考量第三者在場或其他訪問情境相關變項均有待修正。

未來此領域之研究仍有待討論的議題分述如下。首先，我們需對第三者在場做更精緻的界定與分析。本研究雖不僅止於是否有任何第三者在場的粗略兩分界定，再細分成小孩與成人在場是否足夠仍有爭



議之處。未來的研究可以再依據第三者在場與受訪者的關係加以更精確的界定。同時我們也可將其他相關的概念列入分析。這些相關的概念包括：各種不同類型的第三者、在場各類型之第三者的人數、第三者在場的時間、期間與地點等。如此對包含了以上互相關聯之概念變項等的第三者在場效應才有更深入探討的可能性。

其次，如 Dijkstra and Van der Zoumen (1982) 所認同的，因訪問情境非常複雜，我們幾乎不易將所有變項均納入一個完全周延的訪答理論架構中。本研究的缺點是在研究架構中缺少所謂訪員或受訪者對自己角色扮演或訪問工作之認知等的主觀變項 (role-restricted characteristics)。爲了補足這項缺點，未來的研究中納入這類變項是必要的，例如：訪員或受訪者對訪問情境的主觀態度，他們對自己在訪談中的角色扮演的瞭解程度與自我評價。

第三、本研究在不同類型題目回答的第三者在場效應上並未得到一致且符合理論假設的結論。尤其是在回答品質上，與前人研究結果的差異如此明顯很可能是因爲對答題品質的界定有所不同。未來繼續在回答品質上檢証仍是必要的。而在回答分佈上，本研究與前人在對事實性題目之回答的研究發現相反，可能在於題目的選擇。本研究使用之『家中同住人數』與第三者在場隱含著密切的相關性，可能因此無法對第三者在場效應做正確的預測。

第四、本研究的複迴歸模式分析證實控制變項（受訪者與訪員個人特徵與問卷填答方式）對第三者在場訪答效應（非品質面向）有削減、虛假、與增強的效果。那麼接下來與因果模式分析有關且仍須繼續探討的問題是確切的來說，到底哪些控制變項個別或共同造成這些分歧的影響效果。關於這點，我們必須在訪答效應理論的建構上做更深入且周延的修改。



第五、本研究發現至少在事實性題目與個人收入之敏感性題目的答題上受到各類型第三者在場的明顯影響，以及小孩與成人均在場對婚外情這種兼具敏感性且社會讚許性題目的回答有明顯的影響效果。這個發現提供我們的啓示是，在較敏感性題目的回答上，我們需注意其可能會受到他人在場的影響，且越多他人在場影響可能越大。

第六、本研究結果仍支持第三者在場對訪答有所影響。未來在訪員訓練中吾人仍須繼續多加強訪員對第三者在場效應的認知，並在訪員督導與管理上，我們不僅須要求其具體實踐單獨的訪問情境，更應在訪員訓練課程中提供各種可以避免無關之第三者在場的策略與技巧說明。

第七、本文作者曾經利用於五年前執行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嘗試在相同主題的題目上作訪答效應的比較分析。但是，由於不同調查問卷中第三者在場的回答方式不同，早期的界定方式較粗略。且兩期資料在社會讚許性題目——尤其是屬於較敏感性的，與婚姻或男女關係有關的題目——上可利於研究比較的依變項不甚一致。因此在對深入的比較分析有執行與意義上的疑慮之下，本研究才侷限在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三期二次卷一的分析。當然，未來若能作多筆調查研究資料之比對或趨勢的分析是絕對重要且有意義的。至於，這種需要長期資料蒐集的研究則需在研究設計上做好嚴密的規劃。

參考書目

田芳華

1996 〈自填與訪填對答題效應之影響〉，《調查研究》，2: 59-88。



胡幼偉、蔡炯青及郭文平

1994 〈第三者效果：一項民意研究的新課題〉，《民意研究季刊》，190: 49-68。

Aquilino, William S.

1993 "Effects of Spouse Presence during the Interview on Survey Responses Concerning Marria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 358-376.

Blair, Edward

1979 *Interviewing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s, in Improving Interview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Design*. Jossey-Bass: CA: San Francisco, 134-146.

Bradburn, Norman M.

1983 "Response Effects, in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ed. P.H. Rossi, James D. Wright and Andy B. Anders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89-328.

Caplow, Theodore

1956 "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 Interview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II (September): 165-71.

Demaio, Theresa J.

1984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Survey Measurement: A Review, in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I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ed. Turner and Martin. New York: 257-281.

Dijkstra and Van der Zoumen

1982 *Response Behaviour in the Survey-interview*.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unther, Albert

1991 "What We Think Others Thin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8(3): 355-372.

Hartmann, Petra

1994 "Interviewing When the Spouse Is Pres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6(3): 298-306.

1995 "Response Behavior In Interview Settings of Limited Priv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7(4): 383-389.

Martin, Elizabeth

1984 "The Role of Respondent, in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ed. Charles F. Turner and Elizabeth Marti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orton-Williamss, J.

1993 *Interviewer Approaches*. Cambridge: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

Noelle-Neumann, E.

1974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 43-51.

Pollner, Melvin and Richard E. Adams

1997 "The Effect of Spouse Presence on Appraisals of Emotional Support and Household Stra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 615-626.

Reuband, K.-H.

1992 "On Third Persons in the Interview Situa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4(3): 269-274.

Silver, Brian D., Paul R. Abramson and Barbara A. Anderson

1986 "The Presence of Others and Overreporting of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 228-239.

Smith, T.-W.

1997 "The Impact of the Presence of Others on a Respondent's Answers to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9(1): 33-47.

Sudman, S. and Norman M. Bradburn

1974 *Response Effects in Survey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Taietz, P.

1962 "Conflicting Group Norms and the 'Third' Person in the Intervie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 97-104.

